

《學記》：蔣中正的讀書生活

呂芳上 國史館館長

近年來，出版史與閱讀史的研究，在學界廣受注意。研究人物的傳記，個人閱讀的歷史更成為值得重視的焦點。閱讀是一種思維的方式，閱讀意義的尋找，包括讀什麼書，在那裏讀，什麼時候讀，為什麼讀，如何讀，讀了以後又如何？均成為可以討論的重要議題。《蔣中正總統五記》中的《學記》，正提供了這方面探討的絕佳材料。

《學記》是《五記》中的一種，原是抗戰時期蔣中正命王宇高、王宇正據蔣日記分類編輯，以讀書心得彙集而成。內容起於1892年止於1943年，共32卷20餘萬字。依照學者的研究，蔣中正1920至1940年間，每年閱讀書籍至少10種，1919至1945年總計閱讀200餘種，其中傳統史籍約80幾種，新書100多種。留日時期已開始讀王陽明、曾國藩、胡林翼等人文集，一生對四書五經尤其是中庸、大學一再琢磨，視為修身養性之本，內省之據。其中曾國藩的影響，在《學記》中處處可見。蔣讀書一向取慢讀、精讀態度，不終卷不讀他書，一書反覆閱讀，由頭至尾，不肯中斷。

蔣早年即熱切追求新知，道德要求亦高，讀書具時代性與實用性。《學記》中顯示，蔣為了帶兵、從政，讀政書兵書，除孫中山的著作外，《孫子兵法》讀得最為頻繁，《周易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聖武記》、《曾胡治兵語錄》均屬反覆閱讀之書目。為了時代治國之需，1930年代讀《鄭子產傳》、《張居正評傳》、《王

安石傳》，均推崇他們的治術。1920年代社會主義流行，讀馬列書刊，讀各國革命史籍，讀新文化運動相關書籍，可列為「五四青年」。蔣早期留學日本，對日本歷史與政治發展有一番掌握，有學者稱蔣的文字甚至有日本筆調和詞彙。1930年代日本侵華日亟，他又回頭再讀有關日本的著作。為了認識敵人作知己知彼的工夫，讀共黨的相關文獻；為了在剿共作思想上作準備，有很長時間非常在意黑格爾的辯證哲學，不只自己讀書，且要部屬一起閱讀，不只靠閱讀，同時請學者（賀麟）講授。抗戰前後，蔣對宋明理學有很高的興致，1942年初訪印，蔣在飛機上還孜孜不倦地讀宋元學案。抗戰時期，尤其在1940-1943年間的《學記》中，幾乎通篇援引宋明學案的文字。他熱中於宋明理學，認真研讀宋元學案，與錢穆看法接近，當時國立編譯館著手編宋元明清學案，是蔣授意，其中《清儒學案》即是由錢穆承擔。1942年春，蔣召見錢穆，所談均涉宋明理學，尤其明末清初遺民顧黃諸家。這一方面的努力顯示他個人在做修身養性作克己自反的功夫，一方面藉此可瞭解他對傳統思想與現代生活的掌握與思考。到1940年代他對梁啟超在學術史上的造詣和貢獻多所體會，對梁的學術與生平，開始有一番新的評價，後來國民政府終於為梁啟超頒發了褒揚令。

在《學記》中涉及的西方著作，多半是中文譯本，如《拿破崙傳記》、《西洋通

史》、《天演論》、《經濟學原論》、《易卜生記》、《世界大戰史》、《科學泛論》、《馬克斯學說概要》、《德國社會民主黨史》、《蘇維埃共和與憲法》、《日俄戰史》、《心理學》、《統計學》、《太戈兒傳》、《列寧叢書》、《俄共史》、《西洋近世史》、《聖經》、《俾斯麥傳》、《變亂與革命技術》、《土耳其革命史》、《黑格爾學述》、《印度地誌》、《培根與笛卡爾學案》、《孟德斯鳩傳》、《荒漠甘泉》等，範圍相當廣泛，如與他的行事對證，出於治國之需的目的，很是明顯。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，《學記》中記：蔣自謂蒙難之後，決志一死以保全人格，日誦孟子養浩然之氣，25日出險，復讀孟子及大學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。在《西安半月記》中，蔣與張學良有關師法古人與研讀新書、追求新知的對話，說明讀書對他一生行事有相當影響。

蔣讀書不算有系統，平日偶也讀雜書，包括小說如《西遊記》、《福爾摩斯探案》；也讀期刊論著，1942年6月20日的日記中提到，讀了有關柏拉圖教育思想和北宋外患和變法的論文後，有所感的說，平時非大部頭經史學不足觀的想法是不對的。1930-40年代，除了讀書之外，《學記》中也透露他閱讀之餘的知識來源是「聽講」。他邀約專家學者，包括大學教授、外國顧問為他講課，以尋求西方新知。以1932年為例，邀請朱祖晦講「統計學概要」、馬寅初講「國

際經濟之大勢」、周鯁生講「國際聯合會內容」；王世杰講「英、美、法政治制度」、楊端六講「幣制」、劉秉麟講「經濟學」、李惟果講德國及土耳其革命史等，1941年聘賀麟講黑格爾哲學。粗略的統計，蔣邀請專家講課，涉及有關經濟議題的、有關政治制度者，各有9次，有關外國名人傳記和本國學術傳統以及西方哲學的，也各有兩次。「聽講」一方面是補他外文書閱讀之不足，一方面也看到他學、思的歷程。

蔣自謂四十歲後始讀經書，此後不再中輟，1937年6月14日，《學記》記曰：「近以預定之書不能如期閱讀，是大傷悲之苦，可痛也。」1942年8月22日，看朱晦翁學案附錄後，記曰：「黃勉齋狀朱子之行云：『終日儼然，端坐一室。』又云：『其可見

之行，則修諸身者，其色莊，其言厲，其行舒而恭，其坐端而直。』吾讀此，甚愧！吾坐立不端，容止無定，何以希聖！蓋余自西安事變以來，腰脊受傷，故批公牘、讀書，皆臥榻寫作，而不能正容端坐者久矣。小子當加以強勉焉！」他讀書態度認真，可見一斑。

《學記》的豐富讀書資料，可以提供下列思考：蔣的閱讀與思想的互動關係如何？對人生觀與政治事功的影響怎樣？閱讀與宗教的關係可否作進一步印證？民國史上重要政治人物如孫中山（重西書）、蔣中正（重經典）與毛澤東（重文史）的「閱讀」習慣與方式是否可作進一步比較、研究與討論？如是，《學記》與其他四記互相參讀，便更有必要了。